世界文明格局演进与文化遗产保护战略*



单霁翔

故宫博物院 北京 100009

摘要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发展进步，都是人类文明价值的凸显，古国文明责任的担当，同时也成就了闪烁文明之光的伟大国家。不幸的是，长期以来古国文明保护和传承遭到来自三个方面的严重挑战。一是军事战争带来的野蛮破坏，古国文明面临生死存亡；二是全球化浪潮导致文化冲突加剧，守护人类共同价值的道路异常艰难；三是自然灾害的不可抗力则从古至今潜藏着威胁。文明古国作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存在，作为推动世界发展的有生力量，再次被推向时代前沿，具有广泛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发展是文明古国共同的战略目标。因此，应该聚焦发展、分享经验，深化互利合作，努力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包容发展。文明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合作伙伴、全球伙伴。充实文明古国战略协作关系内涵，建立更加紧密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共同实现民族复兴。

关键词 文明古国，文化遗产保护，文明交流互鉴，文化自信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17.07.002

今天，人类社会需要客观评价世界民众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人类古老文明的延绵传承，是推动全球文化繁荣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是增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塑造民族记忆认同的重要因素。

今天，人类社会需要清醒认识人类古老文明传承面临的冲击：军事战争带来野蛮破坏，古国文明遭遇生死存亡；全球化浪潮下文化冲突加剧，文化遗产保护道路艰险异常；自然灾害的不可抗力则从古至今潜藏着威胁。

今天，人类社会需要有效地保护和传承人类古老文明，对当代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和意义：多彩，应是世界文化繁荣发展的生动写照；平等，应是民族艺术形态多样的真实面貌；和谐，应是人类文明兼收并蓄的理想画卷。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7年5月8日

1 全球视野：推动国际交流合作，留住人类共同遗产

1.1 人类古老文明的延绵传承，是推动全球文化繁荣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亚洲、非洲、欧洲及拉丁美洲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璀璨的人类文明。文化底蕴最深厚的首先是举世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古国，分别位于尼罗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四大文明古国之外，还有古希腊、古罗马、古波斯、古玛雅等重要的古代文明。这些古老文明虽然位于不同地域，但均创造了人类早期的国家、城市、文字、金属工具、天文学、医学、数学、哲学、宗教等，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文明源头。这些古老文明延绵发展，交往融合，相互辉映，成为促进人类文化繁荣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回顾历史，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发展进步，都是人类文明价值的凸显，也成就了闪烁文明之光的伟大国家。

在广袤的地理空间内，人类古老文明孕育了世界上实力最为强盛、文化最为辉煌、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曾经拥有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发达的开明社会。这些文明古国为人类保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以及各种古代艺术品和古籍文献。放眼全球，人类社会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对历史文化的尊重，也推动了国际遗产保护的交流合作。对于当下而言，文化遗产不仅是古代文明的记录和见证，更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平等对话、和平共处的纽带和桥梁。

古代亚、非、欧三大洲文明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独自形成，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就像四颗珍珠散落在北非和欧亚大陆的广阔空间。囿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当时生产力的水平，各文明相互之间无法实现直接交往，甚至相互之间不知对方的存在。但是，历史的发展规律决定各文明古国必然要向外界伸展探索之臂，间接信息传递和文化贸易往来逐渐出现。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华文明，始终在不断探索与其他文明进行交往。古代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亚洲、非洲、欧洲之间的商贸之路，更是三大洲之间多层面的交流之路。

1.2 长期以来古国文明的传承和人类遗产的保护面临严峻挑战：军事战争带来的野蛮破坏，经常使古国文明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古代时期，王朝的更迭和种族冲突所造成的战争是摧毁文明的最大推手，比如苏美尔人最早创造的两河流域文明，最后在战乱中被伊斯兰文明所取代。近代时期，西方列强发动殖民扩张，美洲印地安人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等土著部落被摧毁，印度国家遭遇分裂，伊斯兰文明饱受压迫，大清帝国任凭宰割。无数古迹遗址、建筑石刻以及文献典籍等文化遗产在战争中被损毁、被掠夺。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有计划、有组织地劫掠被占领国家的珍贵馆藏文物，摧毁和破坏被占领国家的不可移动文物，给欧洲文明和文化遗产带来了空前的劫难。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半个世纪中，日本官方、军方和民间在中国领土上开展的所谓文化财产调查以及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国文物的大规模劫掠更是罄竹难书。有感于战争对于人类文明的摧残，国际社会于 1954 年 5 月 14 日在海牙签署了《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海牙公约》）及其协定书。

但是，“冷战”期间先后爆发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一系列局部战争，《海牙公约》更多地沦为一纸空文，朝鲜平壤古城内的文物和艺术品遭到联合国军的劫掠，越南顺化古城被轰炸的满目疮痍。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又相继爆发了海湾战争、波黑内战、科索沃冲突、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古国文明更是命运多舛。波黑内战中，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遗迹、伊斯兰教的历史建筑几乎无一幸免。

1999 年，国际社会通过《海牙公约》第二协定书，

将其所有规则扩展到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并建立专门机构——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保护委员会，强调文化财产在战争和敌对方占领时享受豁免，制订了对破坏文化财产的肇事者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并要求各国在和平期间采取防范措施，以确保文化财产不在战争中被损毁。

然而，局部战争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不仅没能有效阻止，而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进入 21 世纪，极端主义的武装冲突和军事战争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破坏最为严重，大批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沦为武装冲突的牺牲品，或遭遇极端组织的文化清洗。在阿富汗，塔利班摧毁了巴米扬建于 1 500 年前的两座珍贵大佛雕像。在伊拉克，孕育了古巴比伦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直战乱不已，文明古迹饱受摧残。在叙利亚，大量文物古迹在战火中受损，6 处世界遗产全部被列入濒危名录。

1.3 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是增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塑造民族记忆认同的重要因素

为更好地研究和保护这些人类古老文明的见证物，1945 年 10 月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旨在促进教育、科学及文化方面的国际合作，以利于各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维护世界和平。1947 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订了《关于两组织之间进行合作的途径和方法》的协定。从此，国际博物馆协会成为执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博物馆事业规划的合作者。

1959 年，埃及政府计划修建阿斯旺大坝，但大坝工程可能危及尼罗河河谷里的珍贵古迹。于是，埃及和苏丹两国政府向联合国发出援助请求。196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挽救努比亚遗址国际行动”，50 多个国家集资 4 000 万美元，成功地保护了这些世界遗产。1965 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波兰华沙成立，由世界各国文化遗产专业人士组成。此后成为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为世界各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咨询帮助，并积极开展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合作协调工作。

在抢救埃及努比亚古迹的国际行动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识到，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的威胁，除了年久失修等原因外，更由于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加速变化，使遗产的存在环境日益恶化，经常面临损毁和破坏的威胁，所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72 年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要求各缔约国要承认确定、保护、保存、展出本国领土内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并建立一个国际合作援助体系，组成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制定《世界遗产名录》，接受国际援助申请，设立世界遗产基金。自 1975 年《世界遗产公约》生效以来，截至 2016 年 7 月，全球共有 1 031 处世界遗产，包括 802 处文化遗产、197 处自然遗产，以及 32 处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

1.4 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和联合行动更有效地保护古国文明、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已成为国际社会亟须考虑并付诸行动的问题

“多彩，应是世界文化繁荣发展的生动写照；平等，应是民族艺术形态多样的真实面貌；和谐，应为人类文明兼收并蓄的理想画卷”，这是我们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多样性普遍宣言》的深情阐释。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道路艰险异常，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的威胁一直存在。正如《世界遗产波恩宣言》所提醒的，“我们有责任保护因其自然美、独特性和普遍性而具价值的世界遗产，使它们免于因过度开发、自然灾害、平民骚乱或武装冲突造成的破坏”。因此，我们倡议文明古国率先行动起来，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以及全球发展战略等框架内开展交流合作，探索互惠互利的可行性交流路径和合作方案。

文明古国之间可以通过适时举办世界古代文明保护高峰论坛，搭建起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使来自古代文明发祥地各国的博物馆馆长、知名文化学者、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以及政府文化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从保护古国文明的物质文化载体和非物质文化载体入手，深入研讨世界古国文明保护议题，再扩大到整个文化层

面，相互深入了解，扩展交流内容，提升交往层次，再逐步提高文明古国间的交往规格，并通过文明古国的和平倡议，发出保护古国文明的共同呼吁。

文明古国之间可以通过举办古国文明保护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从战略性发展视角，研究和探讨在当今国际环境下，世界文明古国文化遗产在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就世界文明发展形势中出现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探讨，推动古国文明在当今人类发展中发挥持久作用。同时加深文明古国之间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文化交流，加深文明古国相互间的了解与认识，并就国际文化领域的热点问题，发表共同看法，寻求解决之道，在解决文化与文明冲突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国际上发出文明古国的共同声音。

文明古国之间可以通过共同举办古国文明联合展览，集中展示各国历史悠久的珍贵文物和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果，使全世界看到文明古国的文化魅力，感受到文明古国的文化震撼。通过一系列文化活动，扩大文明古国间各个层次、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让世界加深了解文明古国的辉煌文明，了解文明古国的文化状况，了解文明古国的发展诉求，使之成为提升古国文明和文化影响力的一系列重要行动。

2 中国方案：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2.1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古代中国开辟了联结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东西方的贸易中心和文化枢纽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始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历史性地创建了一条由东亚至欧洲的陆上交通大动脉，将中国与中亚、西亚直至南欧的广大区域连接在一起。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以中国长安、洛阳为起点，经中亚向西到达地中海地区、向南延伸至南亚次大陆，分布于横跨欧亚大陆东西长约 10 000 公里、南北宽约 3 000 公里的区域内，是人类历史上交流内容最丰富、交通规模最大的文化线路。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产生于陆上丝绸之路之前。秦汉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交流往来就已比较频繁；唐宋时期，从泉州、广州出发的商船经我国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到达了东非和欧洲；而明代，郑和的船队最远更是到达了非洲东南部的一些地区。自秦汉至明清，中国政府在 18 000 公里海岸线的重要港口，设立主管外贸的官方机构，使其成为各国使节和客商云集、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中心。

在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时期，丝绸之路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对话和融合提供了通道，并对中西文明产生深远影响。汉代通西域，带来了中亚和西亚的文明，佛教传入中国，在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对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丝绸之路开通形成双向交融的文化格局，唐代文化既得以向外广泛传播，同时也从外面得到很大的补充。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带来欧洲的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包括天文、历法、数学、武器、地图、建筑、绘画和其他自然科学；同时中国儒学也经此传入欧洲，并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2.2 作为多元文明碰撞与交流的产物，丝绸之路遗产并非中国独享，它一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丝绸之路对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与对话，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千百年来，不同的文化在古老丝绸之路上交相辉映、相互激荡，积淀形成了世人共知和推崇的和平、开放、包容、互信、互利的丝绸之路精神，而且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正因为丝绸之路独特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我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它的研究和保护。

198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综合研究：对话之路》深入探讨了丝绸之路文化的复杂性，并在组织系列丝绸之路科考活动，包括 1990 年从西安到喀什的沙漠线路考察、1990—1991 年从威尼斯到大阪的海上线路考察、1991 年中亚地区草原线路考察、1992 年蒙古游牧线

路考察，以及1995年尼泊尔佛教线路考察。在此基础上，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提出整体多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006年，中国国家文物局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签署了《丝绸之路跨国申报世界遗产吐鲁番初步行动计划》，确定编制《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概念性文件》。接着，2008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5个国家联合通过了该文件，于2009年共同启动“丝绸之路”文化线路系列跨境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并由参与丝绸之路项目申报的所有缔约国代表组成了丝绸之路系列世界遗产申报政府间协调委员会。

2011年，在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召开了“丝绸之路”系列跨境申报世界遗产第二次协调委员会会议，确定丝绸之路分2条跨国廊道申遗：一条是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跨国申报遗产廊道；另一条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跨国申报遗产廊道，使“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的相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同年，中国政府调整申报世界遗产项目预备清单，组织编写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列入预备清单的申报文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普遍价值和保存状况作出说明。2014年，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跨国线性遗产之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是中国第一个跨国联合申遗项目，标志着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合作的一个新起点，对于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和文化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3 古老的丝绸之路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把中国同欧亚国家的互利合作不断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分别出访中亚四国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4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将“一带一路”列为本届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将丝绸之路延续千年的经济、文化、商贸友好交流传统继承下来并赋予新的时代含义，为各国间的人文交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一带一路”以连接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古城的线路网络，形成了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宝库，在历史上为世界伟大文明的兴起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共有近300座历史城镇，沿线各国拥有200余项世界遗产，其中世界文化遗产分布最为密集，这里既有包括雕塑、壁画等各门类的艺术珍品，也有古城、宫殿、陵墓等气势恢宏的建筑遗迹，还有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代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借助传统概念和历史资源，也包含着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的内在诉求。

“一带一路”沿途是世界上典型的多类型国家、多民族、多宗教聚集区域，古代“四大文明古国”诞生于此，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也发源于此并流传至世界各个角落。“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经贸合作带动人文交流，必将在各民族、宗教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也为加强国家、民族、宗教间的人文交流和相互理解、消除彼此的隔阂与误解、增强尊重互信、共创人类文明繁荣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3 故宫梦想：坚定文化自信，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1 故宫遗产包括故宫古建筑群和故宫博物院藏品两大部分，两者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中都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和价值

故宫建筑群是中国现存古代官式建筑的最大实例和最高典范。故宫建筑群原名紫禁城，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及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溥仪退位，共24位皇帝在此居住执政，是明清两代国家的政治中心和权力中枢。故宫建筑群既有深厚的历史价值，又有鲜

明的艺术价值，其空间格局体现了中国传统礼制文化的规划理念，其园囿布置展示了中国古代宫廷园林的艺术成就，其建筑档案保存了中国古代营建制度和传统技艺的重要信息。

近年来，前来参观故宫博物院的贵宾逐年增多，使笔者有机会向他们介绍故宫文化所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一脉相承。每当来到太和殿前，笔者都会介绍，太和殿的“太和”之意，出自《周易》乾卦，意为天、地、人均按照自然规律，通过聚合达到和谐，就会天下吉利，万物才能各得其宜，天地才能长存永固。自古以来对于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渗透在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之中，中华文明一贯主张“天下大同”，希望“协和万邦”。

由此联想到，当前人类社会也需要共同构建起和谐世界观，站在新的文明高度来审视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取长补短。通过对话、交流、沟通，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享文明福祉的新世界[1]。

故宫博物院藏品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完美表达和系统展示。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在故宫博物院的各类文物藏品里，均能得到充分的印证。从时间跨度上来看，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从地理范围而言，囊括了古代中国各个地域的文明精华，包容了汉族和古代众多少数民族的艺术精粹。截至 2010 年 12 月，馆藏文物总计 1 807 558 件（套），其中珍贵文物 1 684 490 件（套）、一般文物 115 491 件（套）、标本 7 577 件（套）。故宫博物院堪称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宝库，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文化艺术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象征。

3.2 皇宫转变为博物馆，皇家收藏从秘藏走向公开，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和艺术内涵，是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时代见证和经典缩影

20世纪初期，在中国社会政治变革和文化转型历程中，紫禁城从一处专制帝王的皇家宫殿逐步走向一个公共的博物馆。1914 年，古物陈列所成立，奉天、热河两行宫藏品公开展览，紫禁城前朝陆续开放。时人评价其“创公共览古之新纪元”。1924 年，逊帝溥仪被迫迁出紫禁城，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品，筹设图书馆和博物馆。1925 年，故宫博物院建院，内府皇家收藏公开展览，紫禁城内廷对外开放。时人赞誉其“为辛亥革命未竟之事业”。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政局动荡，平津文物岌岌可危。1933 年 2 月—5 月，13 491 箱故宫文物为避战火，分五批南下，暂存于上海，后转藏于南京朝天宫保存库。1937 年“七七事变”后，故宫文物又分三路向西疏散：南路取道湘桂，直奔黔川，存于安顺、巴县；中路溯长江，经重庆，存于安谷；北路经陇海，至宝鸡，越秦岭，经汉中，穿古道，存于成都、峨眉。抗战胜利后，三路文物陆续集中重庆，全部东归南京。时人将此归功于“国家的福命”。

1933—1948 年，在战争的间隙或是战时，故宫博物院参与或组织国内外文物展览会达 10 余次。1935 年 4 月至 1936 年 6 月，为“敦睦中英邦交”“使西方人士得见中国艺术之伟美”，735 件故宫文物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先后在上海、伦敦及南京展出，影响深远。1939 年 9 月至 1941 年 6 月，“为使苏联民众了解中国文化及抗战情绪”，100 件故宫文物赴苏联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先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展出。时人视其为“一个不屈不挠、生生不息的民族象征”。

3.3 保护好故宫建筑群，保管好故宫博物院藏品，是一代代故宫人肩负的神圣职责；跻身世界一流博物馆，展现中华艺术文化精神，是一代代故宫人不懈奋斗的目标

198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明清故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其评价是：“紫禁城是中国 5 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 9 000 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

明无价的历史见证。”如何保护好故宫建筑群及其博物馆藏品，怎样发展好故宫博物院，成为历任院长必须面对的核心命题。为此，故宫博物院着力于故宫建筑群的保护修缮，埋首于故宫博物院藏品的清理点查，潜心于明清宫廷历史文化的整理研究，专注于中国古代艺术珍品的陈列展览，希望藉此充分发挥故宫遗产的价值，使世人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脉络与精髓。

20 世纪 80 年代，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执掌故宫时期，故宫博物院着力解决破坏性开放问题，制定完整地保护紫禁城及紫禁城文物完整体系的原则；重新确定故宫保护范围，将故宫东、西、北三面护城河及其外沿以内和南面东西两侧护城河及其外沿以内重新纳入故宫博物院管辖范围；研究制定藏品编目计划，逐步建立和完善适用于开放的藏品管理体系。

21 世纪初，文化学者郑欣淼先生主政时期，故宫博物院组织实施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和 7 年文物清理，积极推动国际博物馆合作和两岸故宫博物院交往，大力倡导“故宫学”建设。故宫学所倡导的文化整体性理念，将故宫建筑群、文物藏品和故宫博物院视为有机的文化整体，在类型庞杂、内容交叉的研究对象中，找寻相通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体系，建构合理的学术范畴和学科体系。故宫学所提倡的“故宫在中国，故宫学在世界”的理念，为流散在外的清宫旧藏提供一个学术归宿，也为国际学术的交流合作找到内在动力。

3.4 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如何挖掘故宫博物院的文化潜力，如何提升故宫博物院的国际影响，这是新的时代环境赋予的机遇与挑战

自2012 年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提高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这是新的时代对传统文化复兴的生动阐释和深情召唤。最近 5 年，故宫博物院立足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有序推进“平安故宫”和“学术故宫”建设。目前已经完成“双引擎、四轮驱动”的战略布局：“平安故宫”和“学术故宫”统帅故宫博物院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建设目标，两院（故宫研究院和故宫学院）、两基地（古建筑保护研究国家基地和文物藏品科技保护国家基地）引领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文化传播、古建筑保护和文物修复的发展方向。

2012 年，故宫博物院启动“平安故宫”工程，以故宫古建筑群保护和故宫博物院藏品保管为中心，全面布置七项重点工程，即故宫博物院北院区建设、地下文物库房改造、基础设施改造、世界文化遗产监测、故宫安全防范新系统、院藏文物防震和院藏文物抢救性科技修复保护。预期在 2020 年完成文化遗产完整保护、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安防设施全面覆盖、开放区域适度扩大、文物库房功能改善、文物藏品保护修复的六大目标，并最终实现将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 600 年的历史使命。

2013年，故宫博物院着手建设“学术故宫”，以“故宫研究院”和“故宫学院”为平台，不断完善学术布局，逐步扩大学术影响力。目前，故宫研究院形成了“1 个研究室、15 个研究所和 1 个博士后流动站”的学术布局和人才规划。故宫学院已经完成了苏州分院、西安分院、景德镇分院、深圳分院的机构设置和组织架构。日后，故宫研究院还将继续完善学术布局，激活人才资源，发展成为全国重大课题研究和高端人才培养的基地以及全球故宫学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中心。故宫学院还将继续扩大合作网络，发展成为面向博物馆的专业培训基地和面向公众的文化传播中心。

2020 年，紫禁城将迎来建成 600 周年纪念。2025 年，故宫博物院将迎来百年华诞。紫禁城和故宫博物院正走向百年历史进程的重要 10 年。2015 年12月，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启动，该项目以养心殿修缮工程为契机，集合学术研究力量和文物修复保护技术，探索一套故宫古建筑及藏品的研究性保护的科学模式。2016 年底前，故宫博物院将启动《故宫博物院志》项目，回顾

总结故宫博物院百年历史经验，继承发扬故宫博物院百年学术传统。我们相信，在“平安故宫”实践中总结提炼，在“学术故宫”框架内提纲挈领，在“百年故宫”课题上沉淀提升，故宫博物院将会迎来一个新发展，更上一个新台阶。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共存与和谐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当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和全球博物馆业务是一个开放的、互动的综合性系统，文化遗产和博物馆藏品在保护文化多样性和塑造文化认同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日益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2016年10月，由故宫博物院主办的“世界古代文明保护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埃及、印度、伊拉克、希腊、意大利、伊朗、墨西哥8个文明古国的文化代表和来自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国际文物保护修复、国际博物馆管理诸领域的文明使者相聚紫禁城，通过交流与对话，共同解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携手寻求人类文明可持续传承的有效途径，共同发起《太和宣言》。希望通过学术交流与合作，各文明古国之间切实加深跨文化交流和跨种族理解，不断推进跨国界合作和跨区域互动。期望通过文明对话与互动，共同探寻古国文明互联互通、互学互鉴、互利互惠的繁荣之路，努力实现文明古国文化自信、文化包容和文化复兴的振兴之梦。

4 结语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繁荣世界多元文明，切实维护世界和平，文明古国，乃至全球都应该积极作为，共同形成未来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传承古代文明的共同行动纲领。正如《太和宣言》所言：

文明古国中的文化遗产，记录着古国文明的发展历程，是古国文明特性的表现，是古国文明精神的表述，是古国文明核心价值观的表达。我们号召，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框架内，文明古国应该率先交流起来，通过举办文化发展论坛，发出保护古国文明的共同呼吁，形成传承古老文明的和平倡议。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人类创造丰富多彩的文明，它们交往融合，延绵发展，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文化遗迹，构成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我们提议，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框架内，文明古国可以率先合作起来，通过举办文物交流展览，迈出传承古国文明的坚定步伐，促成文明古国之间建立起通畅的交流渠道。

古国文明可以承接历史、联结当下、开启未来，世界各国尤其是文明古国应该站在更广阔的时空节点上，认真审视艺术文化在民族国家交往中的独特意涵。我们期待，在全球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内，文明古国能够率先行动起来，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形成传播古国文明的深刻诠释，唤起跨越文明的对话和跨越种族的认同。

为切实推动本宣言的各项内容和目标，我们承诺，将更深入地探索古国文明的起源、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努力寻求互联互通、互学互鉴、互利互惠的繁荣之路。我们承诺，将更深刻地理解文明古国的交流、合作模式及其规律，努力实现文化自信、文化包容和文化复兴的共同梦想。

参考文献

1 章开沅. 盘点辛亥，要看“三个百年”. 人民日报, 2011-10-11.

Evolution of World's Civilization Patterns and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Strategy

Shan Jixiang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Every step forward of human society is a highlight of human values and an assumption of responsibility by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and it simultaneously makes great nations which flicker light of civilization. Unfortunately, the conserv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has always been faced with challenges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barbarous destruction of wars constantly pushes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to a life-and-death crisis. Secondly, the exacerbated conflicts brought about by globalization make it extremely hard to guard the common human values. Thirdly, the force majeure acts of natural disasters have always been a potential threat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As a significant existence in the world's multi-polarization process and an effective force to stim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have been pushed again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times and are exerting their extensive regional and global influence. Development is the common strategic goal of all ancient civilizations. Therefore, all ancient civilizations should focus on development, share experience, deepen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and strive to realize peaceful, cooperative,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All ancient civilizations must become closer partners in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worldwide, enrich the contents of their strategic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and build a closer partnership of global development, so as to achieve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together.

Keywords nations with ancient civilizations,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cultural confidence

单霁翔 故宫博物院院长，研究馆员、高级建筑师、注册城市规划师。早在1980—1984年赴日本留学期间，开始从事关于历史性城市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研究工作。回国以后，历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房山区区委书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局局长。2012年1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为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获工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3月，获美国规划协会“规划事业杰出人物奖”。2014年9月，获国际文物修复学会“福布斯奖”。出版《文化遗产·思行文丛》等十余部专著，百余篇学术论文。E-mail: gaoliangzhou@163.com

Shan Jixiang A research fellow, senior engineer, and registered urban planner. He started his research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planning of historical citi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areas while studying in Japan from 1980 to 1984.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he was successively appointed as Director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ecretary of the CPC of Fangshan District of Beijing, Director of Beijing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Urban Planning, and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January 2012, he became the Director of the Palace Museum. He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tenth, eeleventh, and twelfth National Committee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President of Cultural Relics Society of China. As a student of Professor Wu Liangyong , an academician of both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Dr. Shan studied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graduated with a Doctor of Engineering degree from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He is a doctoral supervisor and adjunct professor of a number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cluding Peking University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In March 2005, Dr. Shan received 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ward from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APA). In September 2014, he was awarded the "Forbes Prize" b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and Artistic Works. His published works include more than ten monographs such as *Cultural Heritage*: *Thoughts and Practice*, and over a hundred academic theses. E-mail: gaoliangzhou@163.com